

阮元與疇人傳

王 萍

- 一、前 言
- 二、阮元的生平
- 三、疇人傳的編纂
- 四、編者對西學的態度

一、前 言

「疇人傳」是一部性質特殊的人物傳記。編者阮元採集有史以來，我國的曆算家及一般科學家二百八十人，分別立傳，合為一部四十六卷、三十萬字的著作。是書之編纂，前後費時十餘年，其中艱苦，不言而喻。「疇人傳」於清嘉慶十五年刊行問世。書出之後，對於清季的曆算研究，有相當顯著的影響。道、咸以後繼起的學者，鑒於此類傳記之有裨實用，遂不斷續補增修。道光二十年羅士琳撰「續疇人傳」五卷，輯錄自宋迄清的疇人傳記凡四十三篇，以補阮書之未備。體例完全倣照「疇人傳」，首卷列為第四十七卷，以明繼續阮書之意。光緒十二年諸可寶作「疇人傳三編」七卷，補述清代疇人（包括西洋人）一百二十八人，至光緒二十四年，又有黃鍾駿續撰「疇人傳四編」十一卷，所收清代疇人凡四十。若將各種疇人傳合併閱讀，以其體例相倣，前後呼應，幾可視為一部完整的疇人傳記。所以後人的增補，不惟無損阮元之原著，且使其更臻完備，同時亦可顯示阮元當初的創作，立意正確、影響深遠。「疇人傳」是中國曆算學被完全西化以前的重要著述，至今欲研究傳統曆算的學者，仍須仰它為主要的參考資料。本文擬就編撰者的背景，以及對西學的態度方面，略事分析與探討。

二、阮元的生平

阮元是江蘇儀徵人，字伯元，號雲臺。祖父玉堂曾任湖南參將。父親則未入仕

途。阮元於乾隆五十一年正當二十三歲時，得中舉人，隨即到北京去赴會試。在京師與邵學士晉涵、王給事念孫、任御史大椿等遊。其間他作了「考工記車制圖解」二卷，^①並即刊行問世，奠定了他經學研究的基礎。乾隆五十四年阮氏成進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散館第一，授編修。^②越兩年大考翰詹，考題為「擬張衡天象賦」。阮元對天象原有研究，所以這篇天象賦作得很好。乾隆帝親自閱卷，對阮元頗為賞識，擢為少詹事，在南書房行走。他從七品的編修升為四品的少詹事，當是一次超升。不久，帝於乾清宮西暖閣召見，問及書畫、天文、算學等事。^③據稱事後乾隆帝甚得意，曾諭樞臣曰：「不意朕八旬外，又得一人」^④，並將阮元晉升為詹事。這時阮元不過二十六歲左右，却已經升到三品高職了。^⑤他的學問文章，得到皇帝的賞識，使他在學術界名望陡增，成為當時青年學人中的佼佼者。

阮元由科舉正途步上官場，同時他也是一位着重實學的真正學者。他治學的範圍很廣，舉凡天文、地理、金石、詩文無所不窺。乾隆五十八年調山東學政時，撰有「山西金石志」，得搨本一千三百餘。次年調浙江學政，刊刻「淮海英靈集」、「經籍纂詁」一百零六卷、「兩浙輟軒錄」含詩三千首，並撰「曾子十篇注」。此外又撰「海塘志」、「海運考」、「兩浙金石志」及「積古齋鍾鼎款識」等。阮元雖然修書甚多，他却謙虛地表示：『修書與著書不同，余在京奉勅修「石渠寶笈」、校「太學石經」，又常纂修國史，及萬壽盛典諸書。自持節山左以來，復自纂「山左金石志」……，皆修也，非著也。學臣校士頗多清暇，余無狗馬絲竹之好，又不能飲，惟日與書史相近，手披筆抹，雖似繁劇，終不似著書之沈思殫精。』^⑥

嘉慶三年阮元擢升兵部侍郎，轉禮部，仍直南書房，並奉命管理國子監算學。^⑦次年調戶部。到了嘉慶五年任浙江巡撫，阮元才開始擔負地方行政的工作。這一年他三十七歲。就任以後，除海盜、剿艇匪，同時並注意社會問題，如增加育嬰堂經

① 諸可寶纂「疇人傳三編」卷三，阮元傳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。

④ 李元度撰「國朝先正事略」卷二十一，名臣，阮文達公事略。

⑤ 見永瑤等纂「歷代職官表」卷二十六。

⑥ 阮元撰「定香亭筆談」卷四。

⑦ 「疇人傳」三編卷三，阮元傳。

費，設立普濟院拯濟饑民；遇災歉之年，上疏朝廷蠲豁平糶等，切實為浙省人民做事。可見他不但是著述等身的學者，也是一位好官。

阮元在撫浙五年期間，在學術方面也頗有建樹。最著稱的應屬書院之創設。他在嘉慶六年創詒經精舍於杭州，八年立海寧安瀾書院，前者尤負盛名。對於詒經精舍的創立，阮元曾有簡單的敘說：『……於督學浙江時，聚諸生於西湖孤山之麓，成「經籍纂詒」百有八卷。及撫浙，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，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，題曰詒經精舍。精舍者，漢學生徒所居之名，詒經者，不忘舊業且勗新知也。』^⑧當時一般書院多為士子課習制藝之所，而詒經精舍則以考證經史為宗，並兼及天算推步之學。精舍秉承阮元的意旨，聘請名學者為山長，講求經學。先後來精舍主講的，不乏當代知名經學家，如王蘭泉、孫淵如、俞樾等，皆為一時之選。其時一般士子，莫不聞風競起，以詒經精舍為典範，浙省學風為之一變。而精舍造就的人才，益不可勝數。李元度說：「……不十年，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，不可殫數，東南人才稱極盛焉。」^⑨阮元很珍視學生的文章，擇其佳者刊印行世，稱之為「詒經精舍文集」，共出八集。此外尚有與精舍有關的「精舍章則」及「藏書目錄」^⑩。由此可見精舍規模之完備，以及阮元辦學態度之認真。

嘉慶十年阮元丁父憂，歸居故里。其間完成「十三經校勘記」二百四十三卷。又撰「皇清碑版錄編」、「瀛舟書記」及「重刻石鼓文」等。總是勤勉地以修書為己任。

嘉慶十二年入都，進呈「四庫未收書六十種」，附提要。得旨嘉獎，旋補兵部侍郎。不久後受命再撫浙省。抵浙即從事緝盜，終將頑強的海盜張阿弟、蔡牽等悉數殲滅，恢復了地方治安。可是兩年後，竟因對部屬失察而去官，^⑪改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。似乎阮元的官又得從頭做起。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。此時他潛心修撰，創儒林傳。他收集在學術上有貢獻的學者一百四十六人，為之立傳。但述學

⑧ 阮元撰「西湖精舍記」，見謝國楨著「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」，載「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」，頁二八四—二八五。

⑨ 「國朝先正事略」卷二十一，名臣，阮文達公傳略。

⑩ 謝國楨著「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」。

⑪ 其時應在嘉慶十四年以後，獲罪原因是：「坐失察學政劉鳳詒代辦監臨舞弊。」見「國朝先正事略」卷二十一。

行不分派系。^⑭又有創立文苑傳的構想，惜未成事。「疇人傳」之脫稿亦在此時。阮元並不因失官而消沉。任國史館總編纂，也是同樣的勤於業、樂於業，並且還有所創興，可算難得。

由於阮元辦事認真勤奮，不久再度晉升為少詹事，遷內閣學士。嘉慶十七年遷工部侍郎，八月授漕運總督。因為他懂得算學，所以在漕督任內，創立了一種「糧艘盤糧尺算法」。此法經證實為精確可用，朝廷命令各省一律採用。這雖是一件小事，亦頗能見出阮元逢事肯用思考的態度。再過兩年，調任江西巡撫。以平定邪教餘黨有功，^⑮得旨嘉獎，加太子少保賞戴孔雀翎。除平定亂事外，他並致力於向來關心的文教事宜如：改建貢院號舍，校刻十三經註疏等，總以嘉惠學子為務。二十一年調撫河南，同年十一月遷湖廣總督。阮元此時是五十三歲。次年調兩廣總督。在湖廣任期短暫，無甚表現。而在兩廣却做了九年的總督，所以有較多的建樹。

阮元任兩廣總督期間，與外國人略有接觸。不過此時中英衝突尙未尖銳化。從他處理幾件中英民商的糾紛，略可明瞭他對外國人的態度。^⑯他痛恨鴉片貿易，曾嚴懲澳門的鴉片囤戶，使「夷商」無可託足。^⑰阮元對販賣鴉片的英商，尤為嚴厲。遇有英商或水兵欺壓中國民人，即採強硬態度，毫不畏縮。曾將一名毆斃中國民人的英國水手依法處以絞刑。^⑱及鴉片戰爭爆發，阮元已經告老還鄉，不過他仍相當關心爆發於廣東的國際形勢，並向當局貢獻意見。道光二十一年正月，兩江總督伊里布的疏摺中提到阮元的一封信：「……奴才現接原任大學士阮元來函，以風聞琦善到粵之後，該（英）夷未能馴順，晝夜焦思，素知在粵通市各國，啖咭喇之外，惟啖咭喇最為強大。其國地平多米，啖夷仰其接濟，不敢觸犯。而啖夷在粵向係安靜，非若啖夷之頑梗。若優待啖夷，免其貨稅，又將啖夷之貿易移給啖夷，則啖夷必感荷天恩，力與啖夷相抗。且啖夷之船砲，多向海外各國租賃裹脅而來，若啖夷為我所用，則各國聞知，無難瓦解。至啖夷既受恩，啖夷必不服，各省口岸恐

^⑭ 同上。

^⑮ 同上。

^⑯ 參閱「史料旬刊」第五、六期，道光朝外洋通商案，兩廣總督阮奏疏。

^⑰ 「夷務始末」道光朝卷一，道光十六年四月許乃濟奏疏。

^⑱ 「史料旬刊」第六期阮元奏審辦傷斃民婦之夷船水手摺。

有一二處被其衝突，然其勢既衰，我堅壁清野，來則應之，亦不難於却退。……」^⑭ 阮元的意見未獲接納。事實上，從這封信也可看出他對外國的認識是有限的，而對於國際貿易法，更是不瞭解。

阮元任兩廣總督期間，在辦學方面亦有可觀的成績。嘉慶二十五年創辦學海堂以及三水行臺書院。學海堂的教學目的，也是以經古課士為主，不過在體制方面，又較詰經精舍有進一步的改良。學海堂立學長八人，各盡所長，分別任課。據「學海堂志」稱：「此課之設，首勸經史而詩賦備具。應課者各有所長，司課者宜兼衆力。是以丙戌之秋，設立學長八人，同理課事，俾各悉心力以俟大吏裁定而昭布焉。」^⑮ 這種分科設教的制度，在當時確很新穎。阮元在浙江、廣東兩省辦學，都抱定一個宗旨，就是着重實學，不專務舉業。這種超脫世俗的觀念是相當不平凡的。清中葉以來，各省有不少書院紛紛起而效尤，^⑯ 對於當時學風之振興，關係匪淺。

另一方面，對於編書和刻書，他的興趣絲毫未減。在廣東的期間，他曾修纂「廣東通志」，刊刻「江蘇詩徵」一百八十三卷，又刻「皇清經解」一千四百卷，都是篇幅浩繁的纂修工作。

道光六年調雲貴總督，整理鹽政，平定邊境野人。八年入覲，賜紫禁城騎馬。此時他已是三朝的老臣了。十二年遷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。十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。十八年致仕，仍食半俸，加太子太保。二十三年阮元壽八十。過三年加太傅銜食全俸。二十九年去世，享年八十六歲，諡文達。

三、疇人傳的編纂

「疇人傳」雖由阮元署名編撰，而實際上諸種編纂工作：如資料的搜集與編排、數學的演算與印證，以及評論的抒發等，並非他一人所為。最重要的合編者應推李銳。雖然「疇人傳」的編纂者未列李銳之名，但有些事實很能表現他與此傳的

^⑭ 「夷務始末」卷二十一，道光二十一年正月，兩江總督伊里布奏。

^⑮ 「林伯桐等編「學海堂志」頁七。

^⑯ 同上。

^⑰ 如河南大梁書院、江陰暨陽書院、保定蓮池書院等皆是。參閱謝國楨著「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」。

關係。翻開「疇人傳」第一篇是阮元作的序，第二篇就是李銳寫的「疇人解」。李文較長，且旁徵博引，為「疇人傳」這本書的書名作了詳盡的解釋。此可知李銳和「疇人傳」關係之密切。「疇人傳」中又常常出現李銳的數學演算。^②是他實際參與編纂的另一明證。但李銳參加「疇人傳」編纂的事，等到羅士琳編的「疇人傳續編」問世，才正式予以公開。該傳李銳傳載稱：「嘉慶初，內閣阮學士元提學浙江，常延李銳至杭，問以天算。因欲撰『疇人傳』，開列古今中西人數，及應采史傳天算各書，屬銳編纂，商加論定。及撫浙，又令門生天台周洽平相助，編寫諸書，及西法諸書，成疇人傳四十六卷，久刊行世」。^③此處明白指出由阮元屬李銳編纂。但是道光二十年阮元為疇人傳續編所作序文，却又是另一說法。他說：「元少壯本昧於天算，惟聞李氏尙之，焦氏里堂（按尙之係李銳號里堂係焦循號）言天算，尙之往來杭署，搜列各書，與元商撰成疇人傳。」^④

這兩段記載，一說是阮元「囑銳編纂」，一說是李銳「與元商撰成疇人傳」，似乎互相矛盾。其實前者係羅士琳所寫，應較客觀；後者是阮元七十七歲時所寫。其時他已經功成名就，告老在家，所以語意謙遜，將「疇人傳」的編纂，一概歸功於李銳。所謂「元少壯本昧於天算」顯然是自謙的言辭。因為「疇人傳」每傳之後所附的評論，泰半出自阮元之手，他當然不是真正昧於天算的人。早年他曾說：「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，泛覽歐邏之述作，而知夫中之與西，枝條雖分而本幹則一也」。^⑤這是阮元無意中透露出來的實話。他不但知算，且是兼通中西兩法的。他認為「數為六藝之一」，是儒者必備的知識。^⑥不過他也承認積極地研讀曆算，是少年時代的事。做官以後，公務繁忙，就比較生疏了些。^⑦查「疇人傳」編撰之初，是阮元督學浙江的時期，那時他自稱「日與書史相近，手披筆抹」，以編書為消遣。「疇人傳」是他所編許多書籍中的一種，他曾下了一番功夫，應無問題。當

① 例如宋代李德卿傳論曰：「淳祐術數廢闕，李尙之銳曰，以演撰之法推之，當以一百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七歲為歲實，一十萬四千二百四十三為朔實也」。見「疇人傳」卷二十二，宋代李德卿傳。

② 羅士琳編「疇人傳續編」卷五十，李銳傳。

③ 羅士琳編「疇人傳續編」阮元序。

④ 阮元撰「定香亭筆談」卷四，里堂算學記序。

⑤ 同上。

⑥ 同上。

初編纂「疇人傳」時，阮元在學界已早爲人所知，其時又任浙江學政，自應由他具名。至於李銳之名則鮮爲人知，具名與否，關係皆不大。

當然李銳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。而李銳的數學修養始終爲阮元所稱道。曾經說他：「深於天文算術，江以南第一人也。」²⁷他最大的成就在「天元一術」和「大衍求一術」。此二古術當時少有人能通。惟李銳與焦循能通其法。在「疇人傳」刊出以後，又發現了元代朱世傑所著「四元玉鑑」，李銳仔細研究四元術，算學更有進步。李銳不但有過人的天資，又拜於錢大昕門下，於是舉凡經史坤輿之學，無不貫通。於曆算方面，尤能兼通中西兩術之奧妙，並運用自如。他平生但務實學不求榮顯。居家教學，造就弟子甚衆。李銳去世後，阮元收集他的著述，刊刻問世，題爲「李氏遺書十七卷」。²⁸李銳爲學既精且博，助阮元編「疇人傳」又貢獻良多，所以阮元晚年將功勞完全歸於他，也不爲過。

由於「疇人傳」的內容，涉及天文曆算甚至物理、機械等科學，所以不時須求教於人。主要的科學顧問有：錢大昕、凌廷堪、談泰與焦循等。²⁹錢大昕是清中葉的名經學家。乾隆十九年成進士，升至詹事府少詹事。年齡比阮元大三十六歲。錢氏是一位淵博的通儒，他在古算學方面，造詣亦高。他並不偏崇西法，他保持着中西並重的態度，³⁰此點意見頗與阮元相合。試看羅士琳對錢氏的推崇，可知他爲學的一斑：「自來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，合衆藝而精之，殆未之有也。若詹事於儒者應有之藝無不習、無不精、又無一不軌於正，其學可謂博而大矣。」³¹錢大昕在蘇州紫陽書院主講十六年之久，受業於他們下的學子，不但人數多，而且多半精研古學，李銳的算學就是他傳授的。³²因此，當李銳編撰「疇人傳」的時期，常常去向他請益，是很自然的事。我們在傳末的評論中，常可見到錢氏的意見，此處僅舉兩個例子於下：

在劉向傳後所附「論」中，阮元曾引述錢大昕的說法，駁斥天左旋以及七政當

²⁷ 同上書，卷一。

²⁸ 羅士琳編「疇人傳續編」卷五十，李銳傳。

²⁹ 阮元撰「疇人傳」凡例第十七條。

³⁰ 見羅士琳編「疇人傳續編」卷四十九，錢大昕傳。

³¹ 同上。

³² 羅士琳編「疇人傳續編」卷五十，李銳傳。

順天，不當逆天的看法。³³ 阮元自己也以為天右旋是正確的。爲了加強此一信念，遂特別轉引錢氏的言論。可見阮元對詹氏的看法是相當尊崇的。

另一例是陳鼎傳後之「論」：「錢少詹（大昕）曰，十九年七閏之率，乃祖冲之、李淳風輩所擯棄不屑道者，元震（按即臧元震）乃復欲采而用之，是真妄人也已。鼎造成天術，亦不能從其說也」³⁴。這一則是錢氏很嚴厲的評語，阮元全部引錄，必是同意他的說法。

除錢大昕外，焦循、談泰、凌廷堪都是精通算學的經學家。阮元爲編「疇人傳」，曾向他們求教。焦循是阮元的同鄉，精通經史曆算聲音訓詁諸學。阮元與他關係很密切，曾說：「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，少同遊，長同學。里堂湛深經學，長於三禮，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。」³⁵ 阮元在「定香亭筆談」中，又介紹焦循如下：「焦里堂循，江都人。樸厚篤學，邃於經義，尤精於天文步算。與李尙之銳、凌次仲廷堪爲談天三友。³⁶ 秦道古、李欒城之書，³⁷ 久無習者，里堂與尙之特講明天元一、大衍求一術。所著有……「里堂學算記」、「地乘方釋例」、「孫子算經注」，皆能爬梳扶摘，多前人所未發。……」³⁸

凌廷堪是安徽人，客居揚州。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，明年成進士。他輕名利而重讀書，雖經任命爲知縣而不就，自請改任教授之職，認爲如此方可達到養母治經的目的。廷堪貫通羣經，旁及聲音訓詁律呂，以及九章句股三角八線中西曆算之學，而尤邃於禮經。³⁹ 至於凌廷堪和阮元的關係，疇人傳續編編者羅士琳說得很清楚：「凌先生長於阮相國（元）九歲。初識相國，甫弱冠。凌先生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，由是遂以學問相益。迨服闋出游，相國復任浙撫（按嘉慶十二年阮元二度任浙江巡撫），命子常生從學，並爲刊刻禮經釋例。明年歸歛（即廷堪之故里），卒。」⁴⁰

³³ 見阮元撰「疇人傳」卷二，漢代劉向傳。

³⁴ 阮元撰「疇人傳」卷二十二，宋代陳鼎傳。

³⁵ 阮元撰「定香亭筆談」卷四，里堂學算記序。

³⁶ 同上書，卷四。

³⁷ 秦道古即秦九韶，係宋代名算家；李欒城即李冶，係元代名算家。

³⁸ 阮元撰「定香亭筆談」卷四。

³⁹ 羅士琳編「疇人傳續編」卷四十九，凌廷堪傳。

⁴⁰ 同上。

以上諸人不但學問好，又是阮元的知交。對於疇人傳的編纂，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幫助。至於年輕的學者，阮元也努力訪求，真有求才若渴之勢。在校刊「疇人傳」事務中，出力最多的周治平，就是經阮元發掘而加以培植的算學人才。阮元說：「余於天文算法中求士如：臨海洪頤煊、震煊、歸安丁傳經，丁授經，錢塘范景福，海鹽陳春華等皆有造詣，然以臨海周治平為最深。治平拙於時藝，久屈於童子試。余至杭州，治平握算就試，特拔入學。治平精於西人算術，通授時……諸法，明於儀器。……」^④

四、編者對西學的態度

「疇人傳」的編者，站在學術的立場，對西方曆算之精密，並不否認，所以在撰述評論時，對於傳播西學者如李之藻、徐光啓的功勞，頗能保持客觀而冷靜的態度，譬如論李之藻曰：「西人書器之行于中土也，之藻薦之於前，徐光啓、李天經譯之於後。是三家者，皆習於西人，亟欲明其術而惟恐失之者也。當是時大統之疏濶甚矣！數君子起而共正其失，其有功於授時布化之道，豈淺小哉。」^⑤其論徐光啓曰：「自利氏東來，得天文數學之傳者光啓為最深。泊乎督修新法，殫其心思才力，驗之垂象，譯為圖說，洋洋乎數千萬言，反覆引伸，務使其理其法，足以人人通曉而後已，以視術士之秘其機械者，不可同日語矣！迄今言甄明西學者，必稱光啓。蓋精于幾何，得之有本，其識見造詣，非文魁（按即魏文魁）、守忠（按即冷守忠）輩所能幾及也。」^⑥對李、徐二人的評語，可謂客觀而中肯。所謂「反覆引伸，務使人人通曉而後已」，確是西法的一個特徵。但是阮元等對西人則並不讚揚。由於徐光啓曾推崇利瑪竇，遂駁斥之曰：「利瑪竇入中國，西人接踵而至，其於天學皆有所得，采而用之，此禮失求諸野之義也。而徐光啓至謂利氏為今日之羲和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？」^⑦

編者阮元諸人，總以為西術的傳入，是由於中國曆算在明代特別衰落的原故，

④ 阮元撰「定香亭筆談」卷二。

⑤ 阮元撰「疇人傳」卷三十二，明代李之藻傳。

⑥ 同上書，卷三十二，明代徐光啓傳。

⑦ 同上書，卷四十四，西洋，利瑪竇傳。

因此特為指出：「天文算數之學，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，代不乏人。自明季空談性命，不務實學，而此業遂微，臺官步勘天道，疎濶彌甚。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，不得不矯然自異矣。然則但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，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。」^④ 阮元等堅信中國古法優異，精密的西法，也是源自中法的。他表示：「以勾股量天，始見於周髀，後人踵事增修，愈推愈密，而乃嗤古率為舛疏，毋乃成大輅而椎輪耶？歐邏巴測天專恃三角八線，所謂三角，即古之勾股也。」^⑤ 又說：「元嘗博觀史志，綜覽天文算術家言，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，長而為之，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。如地為圓球，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；太陽高卑，與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合；蒙氣有差，即姜炭地有游氣之論；諸曜異天，即邳明不附天體之說。凡此之等，安知非出於中國，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乎？」^⑥ 此處直稱「元」，是阮元自己的看法。另外，也能找到與此相似的說法，可作印證。阮元為焦循所作「里堂算學記序」中說：「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，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為舛疏不足道，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。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，泛覽歐邏之述作，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，而本幹則一也。如西法三率比例即古之今有術；重測即古之重今有；借衰即衰分之列衰；疊借即盈不足之假令；今之三角即勾股，借根方即立天元……（中略）……以此證彼，若符節之合。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，而同者其實。……」^⑦ 可知阮元對於西法源出於中國的信念，是相當堅定的。到了清乾隆年間，西洋傳教士又帶來一些天文曆算方面的新方法與新理論，與早期傳入的又有不同之處。譬如西洋教士蔣友仁，在所撰「坤輿全圖說」中，介紹了三個重要的新觀念：一、天和地皆呈圓形，二、星球運行的軌道呈橢圓形，三、太陽是靜止的，地球等星球皆繞太陽運轉，^⑧ 蔣友仁所根據的是哥白尼的學說，和第谷的說法不同。^⑨ 自明末到清

^④ 同上。

^⑤ 同上書，卷一，周代築方，陳子傳。

^⑥ 同上書，卷四十五，西洋，湯若望傳。

^⑦ 阮元撰「定香亭筆談」卷四。

^⑧ 阮元撰「疇人傳」卷四十六，西洋，蔣友仁傳。

^⑨ 哥白尼原名 Nicolaus Copernicus (1473~1543) 係波蘭籍天文學家，發表太陽靜止，地球等行星繞日而行的學說。第谷原名 Tycho Brahe (1546~1601) 係丹麥人。第谷雖在哥白尼之後，但他仍堅信地球係宇宙的中心，日月均繞地運行。耶穌會教士首先傳入第谷的學說，其說與中國固有的觀念相合。

初，傳入的西學，本身即發生了變化。這和素來守舊的中國學者的觀念大相違背。下面就是阮元的嚴厲批評：「……自歐邏向化遠來，譯其步天之術，……且以為地球動而太陽靜，是西人亦不能守其前說也。夫第假象以明算理，則謂為橢圓面積可（按係指星球繞太陽運行之軌道為橢圓形），謂為地球動而太陽靜，亦何所不可，然其為說至于上下易位，動靜倒置，則離徑畔道，不可為訓，固未有若是之甚者也。地谷至今才百餘年，而其法屢變如此，自是而後，必更有於此數端之外，逞其私知，翫為悠謬之論者，吾不知其伊於何底也。」^⑤ 阮元在以上一段話裏面，毫不保留的說出了他對於西方科學方法的不滿。他在「疇人傳」凡例中，特別列出一條如下：「西法實竊取於中國，前人論之已詳……近來工算之士，每據今人之密，而追咎古人。見西術之精，而薄視中法，不亦異乎？是編（按係指疇人傳）網羅今古，善善從長，融會中西，歸於一是。」^⑥ 此數語大概道出了阮元編撰「疇人傳」的真正用意。他想糾正當時人崇西黜中、是今非古的觀念，所以詳盡的介紹歷代疇人及其貢獻，並不時強調西學源自中國的信念。阮元的保守思想，本很容易被當時儒者接受，而他的地位崇高，學問淵博，更增強了「疇人傳」的影響力。雖然以我們今天的目光度之，他所持的許多證據，多有值得商榷之處，但他因熱愛中國文化而流露出文化優越感，似亦無可厚非吧？。

⑤ 阮元撰「疇人傳」，卷四十六，西洋，蔣友仁傳。

⑥ 阮元撰「疇人傳」凡例。